

在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景田

今天,我们满怀崇敬之情,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这里,我着重追忆乌兰夫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功绩。

一、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组织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

乌兰夫同志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他于 1923 年 10 月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指引和帮助下,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认识到蒙古族人民要改变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同年 12 月,乌兰夫同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参与创办蒙古族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领导了归绥地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斗争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 年 9 月,乌兰夫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 月,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 年 6 月乌兰夫同志回国,7 月即参加组建中共西蒙工委,并负责组织工作,1930 年 8 月,任西蒙工委书记。他在自己的家乡土默特旗秘密联系隐蔽的党员和革命者,建立联络点,组织农民协会,选送蒙古族进步青年到外蒙古党校学习,为党培养干部,扩大革命力量。1931 年 8 月,在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的领导下,乌兰夫同志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开展民族工作,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参与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同志深入到绥远地方驻军和民族部队中做争取工作,还到牧区建立牧民武装。1932 年 5 月,他参加土默川蒙汉抗日同盟会的活动。以后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傅作义部队工作。1936 年 2 月,乌兰夫同志参与策动著名的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此后,他协助傅作义将军,改编蒙旗独立旅,成为当时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1937 年 10 月,他亲自指挥了抗击日军进攻、保卫归绥的战斗。1938 年 5 月,蒙旗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乌兰夫同志代理政治部主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按照八路军的模式,在这支国民党部队中自上而下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坚决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 1939 年春到 1941 年春,乌兰夫同志参与领导的新编第三师转战鄂尔多斯高原,守卫黄河河岸,为阻击日寇,使之难以从北路威胁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

1941 年,乌兰夫同志到延安工作,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民族干部的事业上。在他担任教育长期间,延安民族学院精心为党培养了蒙、回、藏、苗、瑶、汉等民族干部 300 多人。

三、领导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建立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党的七大闭幕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同志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内蒙古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

1945 年 10 月,伪蒙疆政府上层人士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受党中央的委派,乌兰夫同志率少数人前往苏尼特右旗开展工作,使“临时政府”不久即无形解散。周恩来同志称赞他维护祖国统一的英勇行动为“单刀赴会”。1945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同志被推选为联合会执委会及常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在乌兰夫同志的积极努力下,1946 年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在承德举行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于 4 月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1947 年 4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

府,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及实践,为后来新中国全面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重要的成功经验。

1947 年至 1949 年,乌兰夫同志任内蒙古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等职务,领导内蒙古地区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还指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部队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乌兰夫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2006 年 12 月 22 日)

在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 勇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从 1954 年 9 月开始,乌兰夫同志担任了十几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民族工作,并曾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管畜牧、防沙治沙及地方病防治工作,在新中国的民族工作等方面建立了重要功绩。

乌兰夫同志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主张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在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上,乌兰夫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民族地区之间的团结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干部,并充实到各条战线上去。他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经常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要求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建设摆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他明确提出,民族地区的工作千条万条,要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条;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都与民族问题有关,都要为解决民族问题服务。

乌兰夫同志十分关心、重视我国牧区和畜牧业的发展,多次就做好有关工作主持召开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针对有些干部认为畜牧业落后、生产力低、没有发展前途的重农轻牧思想,他反复强调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求有关部门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畜牧业合作化过程中,针对有人把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否定社员个体经济积极性的问题,他提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牧民的意愿办事,强调稳步推进的精神,防止简单急躁的做法。他还提出,牧区能办人民

公社的就办人民公社,能办合作社的就办合作社,不能办人民公社、合作社的就办互助组;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等都要因地制宜,不必强求一律;人民公社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充分调动牧民的积极性。这些重要思想,对于减轻“左”的影响,促进全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抓防沙治沙和地方病防治工作中,乌兰夫同志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1958年,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和西北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上指出,改造沙漠要把种草、种树和保护现有植被、综合利用三者结合起来,对不适宜农耕的土地,要退耕育林、育草。在牧区要进行全面规划,实行划区放牧,轮封、轮放。1960年4月,他在部署消灭鼠疫和防治地方病工作时指出,疫区要迅速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并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设立专职工作人员;要认真制定防治规划,促进防治工作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贯彻两条腿走路,土洋并举、防治结合的方针,认真总结群众的防治经验,并加以提高和推广。这些重要意见和做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乌兰夫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还承担了大量的对外交往工作。他先后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解放 10 周年庆祝活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祝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身份参加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加冕典礼等。多次负责或参与外国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接待工作。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今天,我们纪念乌兰夫同志,就要像他那样,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6 年 12 月 22 日)

在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座谈会上的发言

王万宾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乌兰夫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乌兰夫同志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四届、五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国操劳、鞠躬尽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乌兰夫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会议,就有关重大问题作报告或说明,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推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快立法步伐、推动新时期人大工作向前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尽可能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解决实际困难,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他多次率团出访,会见外国使团和国际友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增进相互了解与互利合作,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

乌兰夫同志高度重视民族立法工作,强调民族立法工作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久安之计。1981 年至 1984 年,乌兰夫同志主持起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他深感这项工作责任重大,亲自主持修改自治法草案达十几稿,多次就有关重大问题和立法程序向中央请示报告,主持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就有关问题作讲话,将自治法草案印发各部门、各地方和专家学者征求

意见。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1984 年 5 月 31 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乌兰夫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在纪念乌兰夫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可以告慰乌兰夫同志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路越走越宽阔,各项建设事业正在稳步快速健康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不断深化,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各族人民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各民族进一步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我们今天纪念乌兰夫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毕生的精神,学习他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多谋善断和灵活务实的工作方法,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以律己的工作作风,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2006 年 12 月 22 日)

我的父亲乌兰夫^①

布 赫

我的父亲乌兰夫生于 1906 年 12 月 23 日,今年是他诞辰 100 周年。追溯父亲一生走过的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旗塔布赛村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诞生,我国第一次大革命酝酿形成。在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中,父亲先后在归绥(呼和浩特)和北京蒙藏学校求学。开始接触革命的新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有幸得到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我党早期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和影响。经过爱国学潮的洗礼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锻炼,他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1923 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由蒙古族青年组成的团支部。在李大钊的关心和指导下,与多松年、奎璧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 年 9 月,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其他同志建立了第一个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这个支部的党员先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和声援“五卅”运动,参加过悼念列宁、欢迎孙中山北上等大型活动的服务工作。

1925 年 10 月,党组织选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苏联,他学习工作了近四年,在为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做翻译工作时,他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鼓励。父亲讲,从那时起一直到以后的几十年工作交往中,周总理

^① 在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时,应《实践》和《中华儿女》两杂志编辑部约稿,写了“继承遗志 造福人民”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两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将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删去重复的地方,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仍以“我的父亲乌兰夫”为文章题目。

对他一直很关心、帮助、支持和爱护。1929年他请求回国参加国内艰苦而炽热的革命斗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了他的请求。父亲把一套俄文版的《资本论》带回了祖国，为了保存这本书，我母亲费尽了心思。有时放在地窖里，有时放在凉房里，生怕书坏了或被国民党军和日伪军抄家时发现。1940年母亲离开家乡时，又把这套书交我大姑云存贵保藏，建国以后才又转到父亲手里。

父亲回国时，我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他以自己的家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他先任中共西蒙工委组织委员，后任书记。回国后的最初两年，他和西蒙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唤醒民众，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党组织，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播撒革命火种；选送蒙古族优秀青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使土默川成了内蒙古革命的发祥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的工作转向了武装抗日，开始筹划建立蒙古族武装队伍。1933年起，他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做蒙政会保安队的工作上，包括争取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抗日。他们对保安队的工作很有成效，而德王却执迷不悟公开投日。经父亲等共产党人策动，在爱国军人云继先和共产党员朱实夫带领下，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2月21日在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之后，父亲帮助爱国将领云继先和白海风整训这支暴动部队，将其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最大的蒙古族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父亲按八路军的模式，在这支部队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系统，并先后任政训处和政治部代理主任、地下党委书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父亲随部队参加了归绥保卫战，并在鄂尔多斯高原坚持抗战。这支部队成为当时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特别是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起了重要作用。父亲以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为基地，发展党组织，培养蒙古族干部，送蒙古族革命青年去延安学习。这样为抗战后开展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

父亲在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家人，1936年寄给我母亲（云亭）的信写道：“云亭：别来无恙，二老安否？孩儿还是那样快活？我虽在千里之外，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盼早一天见到你们。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部队现正在

休整,不日即重返抗日前线,以利再战!致全家安康。夫致笔,民国二十五年。”(此信原件现存塔布赛乌兰夫故居)

1938 年中央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父亲为工委委员。1938 年 5 月,父亲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第一次到延安,亲眼看到延安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父亲认定了只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父亲参加革命后多年在外,全家老小无处安身。父亲托人捎信给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奎璧同志,请他帮助把我和姐姐云曙碧以及大一点的孩子送到延安;把母亲和两个小弟弟乌斌、乌杰送到新三师,和父亲在一起。几经周折,父亲先后把母亲和我们姐弟 4 人及其他乡亲送到延安学习、工作。这样父亲就把我们一家人带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上。

1941 年国民党顽固派发起反共高潮,胡宗南密令白海风处决我父亲。白海风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父亲。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通过地下党组织通知已暴露身份的父亲迅速离开新三师。父亲以送我母亲回家看病为由,带着乌斌、乌杰两个小弟弟,四口人离开部队直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了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延安整风”,参加了党的七大并被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作为蒙古族代表曾多次参加大型民众抗日活动,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演,并以这些讲演和马列原著为指导,全面总结了自己回国后开展地下斗争,领导群众工作,组建、扩充、整训蒙古族抗日武装,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等实践经验。父亲曾讲,他自己提高最大最快的阶段是在党的“七大”前后,这期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的方法,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懂得了怎样去实现党的主张、完成革命任务。经过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的四年学习、工作,极大地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内蒙古斗争形势的认识,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他在思想、政治和理论上日益成熟,逐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45 年 7 月,日本投降前夕,内蒙古正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父亲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8 月初父亲到山西偏关,11 月主持绥蒙政府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内蒙古工作。父亲和杨植霖副主席共同开辟了绥东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斗争形势极其复杂。作为祖国一部分的内蒙古,还多一层民族矛盾。少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乘战后人们思想混乱,社会不安定之机,在各地组建了数个地方性的政府。在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出现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海拉尔出现了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党中央知道这种情况后,派父亲去解决。根据中央指示和我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方针,在晋察冀中央局直接领导下,父亲只带了几个干部来到温都尔庙。父亲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的民族自治,只有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帮助下,内蒙古人民才能彻底解放,才能建立民主政权。其他方式都是行不通的。经过艰苦的思想和坚决斗争,父亲的上述思想被“临时政府”的多数人接受,并通过重新选举的办法先掌握了这个“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事后周恩来总理称父亲不动一兵一卒,“单刀赴会”,胜利解决了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灵活、完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后,中央决定父亲留在张家口“主持蒙民工作”。从此,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父亲不负党的重托和人民对他的期望。根据当时共产党还没有被大多数蒙古族人民接受的具体情况,他提出了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它既是当时我党领导下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群众革命团体,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又具有自治政权成立以前过渡政权的性质。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经晋察冀中央局同意并报党中央批准,在父亲主持下,1945年11月在张家口召开了由各盟旗代表参加的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父亲当选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长。

1946年初,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4月间,根据党中央指示,父亲着手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实现统一领导的问题,根据当时内蒙古复杂情况及时制定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顽固守旧力量,孤立打击反革命力量”的方针,并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他提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各派出7名代表,在承德谈判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领导问题(史称“四三”会议)。这

次会谈是在冀热辽中央分局领导下由父亲主持的。在父亲领导下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按照我们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原则,坚持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自治是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的民主自治。本着团结的态度,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经过双方坦诚地交谈、争论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四三”会议期间,特木尔巴根也积极做了东蒙代表的工作。终于使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张,同意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即自行解散,东蒙古自治政府也随之撤消,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历史至此结束。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撤消以及后来顺利解决的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问题,为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在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四三会议”期间,曾加入过联共的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特木尔巴根提出转为中共党员,在东蒙古自治政府中影响大的哈丰阿也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父亲考虑为了圆满解决内蒙古问题,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人才有利于革命大局,因此同意吸收他们入党。报中央批准后,很快解决了他们的入党问题。正是因为团结了一批由东蒙古自治政府集中起来的爱国民族人士、蒙古族进步青年和少数旧官员,顺利解决了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领导的问题。在解决东蒙古自治政府过程中团结的这些同志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夺取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后,在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时,形成了更广泛的内蒙古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绥远和平解放,又团结了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起义人员,更扩大了团结的范围。这也是内蒙古能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重要因素。

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年头,以父亲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广泛团结了社会各阶层,创建了锡察草原根据地,由东部到西部全面展开了反对美蒋进攻的自卫战争,巩固和扩大了内蒙古解放区,为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7年4、5月间,在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父亲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父亲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5月1日,他庄严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特致电

祝贺。这是内蒙古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人民自己的政府，由此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26天后（即5月26日），东北局决定成立以父亲为书记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的这一决定。党的内蒙古工委建立，标志着内蒙古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最终解决。从此，内蒙古人民在共产党和自治政府领导下，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毛主席在1945年曾讲，要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1946年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父亲再一次进入了军队工作。在内蒙古历史上，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有过军队，但数量不多。抗战时期也只有西部大青山、伊盟有游击队，因此，内蒙古的革命军队较少，有经验、才能的革命军事干部更少。而内蒙古的旧军队却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人民的军队，必须对旧军队进行改造。这个工作很艰巨，当时有不少旧军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有的甚至叛变或武装暴动。父亲讲这不是换军帽的工作，而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工作。一方面把确实不适合在革命军队里战斗的人清除出部队（3年时间里稳妥地有步骤地调整 and 洗刷了8000多人），同时动员广大农牧民参军，补充新生力量，改变部队成分，使劳动群众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另一方面对旧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改造，如在部队中建立、发展党的组织，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实际斗争，培养并大胆提拔使用年轻干部、知识分子及旧军事干部；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党的政策教育；改进军风军纪，改善军民关系，培训新的军事思想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等等。特别是对有民族特点的骑兵部队，进行了重点建设。父亲讲：“内蒙古骑兵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领导下消灭敌人，解放全内蒙古，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任务。”这期间，父亲指挥部队消灭了内蒙古地区的土匪和反动武装。后来在消灭马鸿逵、马步芳军队骑兵对骑兵的战斗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支骑兵部队后来还参加了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部队检阅。内蒙古一些部队是通过改造旧的军队，将游击队整编成正规军，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属于人民自己的革命军队。

父亲作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治政府主席和内蒙古人民军队的

最高领导人,首先抓了党、政、军的建设工作。没过多久,已解放地区党、政工作的组织系统就在他领导下建立了起来。1948年1月,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内蒙古人民解放军边战斗边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在父亲统率下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清除了草原匪患,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内蒙古解放区,直至全部解放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参加了辽沈、平津决战和察绥等战役。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辽阔的内蒙古解放区充分发挥了我东北、华北两大战区战略后方的作用。1949年5月1日,中央军委命令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归东北军区领导。内蒙古军区此时已辖5个骑兵师和16个正规团、1个警卫团。父亲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升为大军区后,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父亲又兼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1955年国家第一次授军衔时,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就圈定了内蒙古的地域范围。1949年3月,父亲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主席同父亲谈话,讲到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地域”,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父亲回到内蒙古后,团结各民族干部与群众,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确定的原则,经过7年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56年完成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使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彻底改变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1954年按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先建立了鄂伦春自治旗,接着于1958年又建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鄂温克两自治旗。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内容和组织形式就是由父亲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首先从内蒙古试点起步的。

自治区政府建立初期,为改变内蒙古地区病、穷、无文化状况,父亲较早地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思路。他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按照内蒙古老解放区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时制定的一系列牧区工作方针和政策,并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内蒙古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把全区分成农业区、牧区、半农半牧区。考虑到内蒙古西部蒙汉杂居地区蒙古族地主占有土地多,

汉族地主占有土地少，蒙汉分别分配土地不能满足汉族农民要求以及蒙古族农民从牧业转向农业时间不长，农业技术水平较低等实际情况，父亲决定蒙、汉族农民统一分配土地，蒙古族农民按平均数多分一份。既解决了蒙汉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加强了民族团结。这些灵活的切合实际的作法促进了后解放地区的农村土改和牧区民主改革时未完成任务的完成。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同时，自治区政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在已解放的内蒙古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进行民主改革，削弱了封建势力，解放了奴隶，彻底铲除了残余的奴隶制度。在内蒙古先解放地区的牧区民主改革初期，牧区的个别地方照搬农村土改的做法，斗牧主、分牲畜，使牧业生产遭到很大损失，甚至出现牧主外逃的严重事件。在父亲主持下，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牧区和牧业经济的特点，在牧区民主改革过程中，逐步制定和实施了“废除封建特权”、“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以及“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既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又很快稳定了牧区各阶层的情绪，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保证了牧区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还组织和带领已翻身的农牧民发展生产、进行贸易、开展文化事业，支援前线，改善民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以父亲为主要领导的内蒙古解放区，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在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期间，首先把发展经济作为重要任务。早在1945年，看到广大农牧民缺乏生活必需品，自治运动联合会根据贸易和生产力互相促进的理论，采取社会集资办法成立了内蒙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商业贸易。由此带动商品流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方面的发展，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逐步解决了农牧民的产品卖不出去，生活必需品买不进来，以及解放前长期不法旅蒙商贩强行不等值交换的问题。

在恢复经济中，父亲针对过去反动阶级统治下的牧民生活贫困交加、疫病蔓延、死亡率高，蒙古族人口锐减、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情况 and 不同时期反映出的不同问题，制定出符合内蒙古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对牧业生产，他始终坚持“牧场归公，自由放牧”、“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对半农半牧区，他提出了以牧为主，保护牧场，禁止开荒；同时在中央支持和全国支援下，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牧区消灭传染病，保证人民的健康，很快扭转了内蒙古少

数民族人民受疾病折磨,人口负增长的悲惨景况。在蒙汉交叉居住地区,结合土改和行政区划调整,取消了“蒙租”^①,解决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问题,永远消除了长期以来造成蒙汉矛盾这一主要原因。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蒙汉及其他各民族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圆满地完成了三年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前进中,父亲下了很大工夫研究内蒙古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父亲认为没有牧业的国民经济是不完全的国民经济。根据牧业和牧主经济的特点,经过试点提出了“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对牧主采取了比对资本家还要宽厚的赎买政策,实现了牧区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平稳过渡,促进了内蒙古畜牧业生产的长时期稳步发展。解放初期在父亲主持下,把世代以狩猎谋生的鄂伦春族人民组织为内蒙古兴安岭护林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为保护生态环境做有益的工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遵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实现了内蒙古经济特别是牧区经济的平稳过渡。对于内蒙古社会经济建设的整体布局,他提出了东林西铁、南农北牧的构想,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放在了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上,以此带动内蒙古整个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内蒙古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把大兴安岭林区建设也放在了重要位置,源源不断地向全国输送木材,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

为了解决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对人材的需求,父亲很早就注意到对干部的培训和教育,特别是意识到培养民族干部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把蒙古族青年送到乌兰巴托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中心,他又是一批一批地把蒙古族

^① “蒙租”:清末以后,由于大批军阀、官僚以及部分蒙古族王公贵族掠夺蒙古族牧场土地,使许多以牧场为生的蒙古族牧民破产,被迫接受土地成为农民。但多数蒙古族牧民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技术,只得将部分土地出租给汉族地商或农民耕种,收取较少的地租。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汉族的“二地主”和“地商”,他们将租来的土地再次转租给汉族农民,从中盘剥剥削,蒙古族地主的生活反而不及这些“二东家”。“二东家”的存在导致了蒙汉劳动人民之间的剥削和矛盾,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取消蒙租实际上就是取消“二东家”。

青年送往延安,接受革命教育,并亲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期和自治政府建立初期,先后在张家口、赤峰、乌兰浩特、齐齐哈尔等地办了各类干部学校,还亲自组建了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并兼任院长。后来成立内蒙古军政大学,他任校长、政治委员,还担任了内蒙古党校校长。在他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不久,就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创办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提议在北京和西北、西南等大行政区各成立一所民族学院。1950年,政务院任命父亲为新中国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中央民族学院的院长。父亲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期间,还非常重视加强蒙古语文的工作。在1953年就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发行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著作及科学常识、生产知识、通俗读物等书籍、报刊、画报;在多数蒙古族小学和部分中学,要以蒙汉两种语文教学。这样可以使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民能更好更快地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激发蒙古族人民建设自治区和我们伟大祖国的更大热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除抓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外,重点抓了高校建设,1957年建立了内蒙古大学,并兼任校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大学,填补了内蒙古高等教育没有综合大学的空白。并与先后创办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农牧学院、林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院校,共同形成了自治区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内蒙古地区以后高教发展和有计划地培养人材奠定了基础。父亲一生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父亲一贯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除了办学校、办各种训练班,他每次讲话都要强调学习问题,要求干部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科学文化知识。见到我们也总是讲,要多读书,多向群众学习,并一再教导我们工作要勤奋、学习要刻苦。

父亲一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他这样做,有效地推动了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倾思潮的影响,将其危害在内蒙古地区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最明显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四清”运动中,从内蒙古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由于父亲和自治区其他同志的努力,当全国有些地方出现大起大落时,内蒙古仍